

重建民國時期的革命版圖

● 譚徐鋒



王奇生：《革命與反革命：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0）。

自幼讀史，涉及近百年來的中國革命時，往往是非此即彼、紅白分明、你死我活，年華漸長，不免有些許疑惑。想來筆者成長的年代還未脫離革命話語的籠罩，畢竟從革命型政黨向執政型政黨轉變口號

的提出，好像也僅是近十年的事情。從史實重建的角度揭示革命話語，尤其是隨之衍生的行動與暴力，似乎也頗為少見。

王奇生的近作《革命與反革命：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》（以下簡稱《革命與反革命》，引用只註頁碼），從反思近百年中國革命的角度，圍繞中國共產革命的思想源流與社會背景、《新青年》的營銷策略與形象再造、1920年代至1937年前後中共在廣東鄉村與上海都市的基層運作實情、1920年代三大政黨圍繞「革命」與「反革命」的話語競爭、北伐時期的「反革命罪」、國民政府掌控地區的基層政治、國民黨高層政治尤其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嬗遞、國民黨政工政策的浮沉，在着眼於當時整個社會的人情與法理之時，從不同側面為我們展示了這一時段的革命政治文化。

以往研究者可能都指出陳獨秀是個很有趣的人，舉凡文章、個人生活與氣節，都相當惹人矚目。然而，一般提及陳氏創辦《新青年》時，對此刊怎樣從模仿《甲寅》，再

從史實重建的角度揭示革命話語，尤其是隨之衍生的行動與暴力，似乎頗為少見。王奇生的近作《革命與反革命》，從反思近百年中國革命的角度，在着眼於當時整個社會的人情與法理之時，從不同側面為我們展示了這一時段的革命政治文化。

1920年代，「革命」被建構為無所不能、無堅不摧的神聖幻象，反對革命者動輒得咎，往往被定位為罪惡之源，「不革命即是反革命」。在話語的交鋒中，作者透過當時三大政黨的競言「革命」，全面呈現出1920年代中國黨派政治的多維場景。

到借助章士釗等名人的名頭，最後藉「科學」、「民主」的話頭與《東方雜誌》等大刊叫板，加之刊隨主貴，陳獨秀成功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後，《新青年》雜誌社一時風雲際會、群賢畢至，似乎鮮有深描。事實是，被後世無限放大的「科學」和「民主」並非該刊關注的重中之重。毛澤東曾稱陳獨秀為「五四運動的總司令」（毛澤東：〈如何研究中共黨史〉（1942年3月30日），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：《毛澤東文集》，第二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403），這一方面的確點出了陳在其中的重要性，學界在傾向於「總司令」一說時，卻或多或少遺忘了陳的老革命黨身份，其間的運作甚至有些下作（如錢玄同、劉半農導演的雙簧），可能在局外人看來是不屑的。

不過，陳獨秀曾坦言只有過激方能佔據主動（其實類似的話梁啟超曾經說過，只是當時任公先生正對即將所向披靡的排滿革命憂心忡忡）。正是在陳獨秀激烈言論的挑戰下，老牌主流刊物《東方雜誌》換主編的換主編，換話題的換話題，銷量更是直線下滑。新文化遠遠未能形成一場運動，其參與者與呼應者的表述相互映照，加上旁觀者的觀察，方能一窺此一被後人所神化的運動之真相。

既往的五四運動研究及中共黨史研究，不可謂不多，往往為研究對象所「騙」，正如胡適研究專家周明之先生所提示的，胡適「在不同的場合，對不同的聽眾，說不同的話」（參見周明之：〈中譯本自序〉，

載周明之著，雷頤譯：《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選擇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3）。怎樣在理解整個社會場景之後，解讀出研究對象及其相關語境，應當是重新解讀老問題的不二法門，作者在這方面可謂樹立了典範。

一般而言，1915年前後，軍閥專橫，民權（對內對上）與國權（對外）難伸，思想革命的確有呼之欲出的趨勢。議會制民主的挫敗，使得知識份子對現實的國家已感絕望，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中國知識界對國家和國家觀念進行反思，進而將國家當作批判甚至鄙夷的對象。正是有鑒於此，傅斯年等人將下手處放在社會，從改造社會着手，掀起社會改造運動。或許五四運動讓不少知識份子見識到群眾的威力，紛紛期待到民間去，到農村去，喚起民眾，動員民眾，從傅斯年的「造社會」到惲代英的「造黨」，都是知識份子對形勢的應對。從中共的誕生到國民黨的改組，均借鑒蘇俄政黨模式，着力增強自我的群眾性與組織力。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，個人（自由）淡出，為救國只好師法蘇俄，從社會尤其是底層改造出發，甚至中共黨員施存統發出了「我很慚愧，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」的感歎（參見王汎森：〈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〉，載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），頁291），組織化的知識份子就這樣被裹挾進權力的黑洞。

「秀才造反，十年不成」，但是聽聽秀才們如何就造反來相互攻訐

也是很有一番滋味的。當然，秀才們說的是「革命」以及連帶的「反革命」。1920年代是中國有史以來政黨政治最為波瀾壯闊的時期，改組的國民黨、新建的共產黨與青年黨，藉群體主義的興起，將「革命」作為自我定位與標榜的核心政論話語，展開黨際互動，「革命」被建構為無所不能、無堅不摧的神聖幻象，反對革命者動輒得咎，往往被定位為罪惡之源，「不革命即是反革命」（頁99）。在話語的交鋒中，作者冷眼旁觀，着力剔除後見之「明」，透過當時三大政黨的競言「革命」，全面呈現出1920年代中國黨派政治的多維場景。

「革命」、「反革命」以及「反革命罪」，在相互攻訐時顯得頗為隨意，落在被攻擊者頭上，迅速演化為語言的暴力，其間夾雜的更多是利害與吸引政治追隨者的考量。以往的革命史研究或思想文化史研究，較多着重於政治派別與政黨領袖思想的細分，未能放開歷史的視野，從當時語境來解讀各方就「革命」的多元解讀。活生生的革命史被簡化、模塊化，更談不上將思想論爭置於生活史的脈絡，充滿玄機的革命抉擇與鬥爭似乎僅僅取決於革命者的賢與愚，肖與不肖。書中對「反革命罪」的考察，既給我們揭示了此一千古奇罪的緣起與結局，更讓人感受到群眾運動的蠻橫與任意。相對而言，被俘虜的吳佩孚手下的舊道德，卻值得讓人倍加珍視（頁114）。

如果說革命話語的交鋒表現最為搶眼的話，1920年代中共在廣東

農村與上海都市的組織動員則明顯勢能不足。以往的黨史書寫，往往將建黨後的發展描繪為有黨呼喚，立即應者雲集；本書通過發掘近三十年來各地編輯的革命文件集，將中共組織動員乏力的真相揭露無遺。近三十年來，各地曾着力收集此類文件集，愈到下層，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愈細膩繁複，作者堪稱中國大陸學者中系統利用此類史料的第一人。政治也是日常，革命者也要生活，作為革命者的中共黨員，在生活的煎熬中要麼成為革命馬前卒，將黨組織化為生存的武器，小者靠黨養活，大者以同志身份作為械鬥的動員號令者；要麼淪為藉革命的名義進行暗殺者。基層黨組織由於經費、信息溝通等的不足，不僅僅陷入失序，甚至往往對地主實施綁票（俗稱「捉豬」）來改善生活，以大殺豪紳地主來宣示革命忠誠（頁189）。以往革命史書寫的鐵板一塊，因為革命者留存的這批「實錄」以及作者的敏銳洞察而真相大白。

反觀國民黨在西南聯合大學的發展，則呈現另一幅場景。以往人們印象中的西南聯大是「民主堡壘」，有意無意間將聞一多等少數在1940年代中期較激進的教授的行動投射為整個聯大師生的行為。作者通過相關檔案的爬梳，發現當時的西南聯大教師加入國民黨者大有人在，而且比例不小，當然其中更多的是人情入黨而非中共式的火線入黨，更多的是礙於面子的俱樂部式清談，而同志情、兄弟愛在高級知識份子之間顯得稀缺（頁244、245）。

本書通過發掘近三十年來各地編輯的革命文件集，將中共組織動員乏力的真相揭露無遺。此類文件集愈到下層，蘊含的歷史信息愈細膩繁複，作者堪稱中國大陸學者中系統利用此類史料的第一人。

《革命與反革命》敘事生動，文字清新，將革命拉回了歷史現場，堪稱重建中國革命史之功臣。發掘革命中的人性，勾勒革命時代的集體心態，反思革命時代大多數的暴力，似乎才能更好地「告別革命」。

眾所周知，中共自詡的成功秘訣是以農村包圍城市，言下之意，失敗的一方——國民黨當然是在被包圍的城市更佔上風。以往大家關注中共在農村如何「振臂一呼，應者雲集」，對國民黨所控制的農村（在中共眼裏是失控的），似乎缺少詳實的交代。在革命風暴的蕩滌下，國民政府權力所及的農村又是何種境況呢？作者從基層政治的角度，反思當時「農村何以成為問題」。以往在農村掌握話語權的鄉紳，經過清末民初近三十年的淘洗，「好人命不長」，所剩多為土豪劣紳，也正是後者日漸控制鄉村，地痞流氓更藉此坐大，苛捐雜稅，加之居間者上下其手，底層鄉民痛不欲生，鄉村從根難起（頁337）。

民國時期保甲長的命運更是讓人稱奇。作為中間人，他們從上面接到攤派任務，不得不向朝夕相處的鄉里鄉親割肉，未能完成任務則會面臨懲罰甚至牢獄之災。這一批人物，在為政府效力賣命之後，一旦政局一變，往往淪為替罪羔羊。在多次藉人民民主專政之名的暴力鎮壓下，原本僅係傳達上峰命令者，如今成為被專政對象，在社會主義新時代被一一清洗；更有不少人不一定夠「格」，卻在講究運動式攤派「地主份額」中掉了腦袋（頁438）。

「革命」，意味着對抗、鬥爭、犧牲，不是我們的朋友，即是我們的敵人，在革命勝利的蠱惑下，無數中國人丟掉了自己的性命，淪為了革命的手段，儘管其中不少人得

以進入革命的萬神殿，但不少人則背上「反革命」、「反動派」之名，飲恨埋骨。如果我們以革命的神聖性一言以蔽之，顯然太不人性，更失去了歷史學的人味。面對這場有史以來參與人數、持續時間與暴烈程度最為劇悍的革命運動，史家面對神話（甚至至今依然在演繹、神化），選擇附和抑或釐清，需要的或許不僅僅是學術眼光。

弔詭的是，革命者尤其是革命領袖，大多文字動人、意氣風發，今日讀來，依然讓人感奮。既往的革命史研究，動輒得咎，不少人有意無意地存有「國史館編纂」的拘謹甚至麻木，常將波瀾壯闊的革命場景簡化為路線之爭、大事記而已，與當年的革命領袖孫文、毛澤東相比，敘述蒼白，面目可憎。《革命與反革命》敘事生動，文字清新，常常給人以別開生面之感，將革命拉回了歷史現場，堪稱重建中國革命史之功臣。相對於西方兩百年經久不衰的法國大革命研究，格局與破壞力巨大的中國革命，相信倘若有心人踵其事而增其華，所得必會無量，也當信此言不虛。

發掘革命中的人性，勾勒革命時代的集體心態，在釐清故實的基礎上，反思革命時代大多數的暴力，促進非「革命」機制的成長與良性運作，似乎才能更好地「告別革命」。否則，遺忘並不意味着太平無事，集體失憶不僅常常令人健忘，更往往導致陳渣泛起、災難重演，這在當下萬國競爭的格局下似乎非國族之福。